



战后欧洲史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美]托尼·朱特著 林骧华等译 王晨校

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全球百大思想家 |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本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 | 托尼·朱特代表著作

一部综合型的、分析型的、反思型的优秀著作。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托尼·朱特以其勤奋精神和渊博学识，走过 1945 年后欧洲的通衢大道和偏僻小径……他不只探索了这个现代大陆的 what 和 when，最重要的是探索了 why。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我大力推崇朱特的《战后欧洲史》……它摆脱了陈腐的冷战模式，合理评价欧盟的角色，为理解欧盟提出崭新而富启发性的观点。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Michael Howard, 英国保守党领袖)



定价：39.00元

POSTWAR 战后欧洲史

[美]托尼·朱特著 林骧华等译 王晨校

Tony Judt

| 卷二 |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欧洲史 (卷二) :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 (美) 朱特著 ; 林骧华 等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4. 9

书名原文 :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978-7-5086-4614-5

I . ①战… II . ①朱… ②林… III . ①欧洲—现代史—1953—1971 IV . ① 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0148 号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Tony Judt,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封面图片授权 : Josef Koudelka / Magnum / 东方 IC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战后欧洲史 (卷二) :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著 者 : [美] 托尼·朱特

译 者 : 林骧华 等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9.75 字 数 : 229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614-5/K · 388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译者目录

| 卷二 |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林骧华

(全书统校, 重版校订)

王晨

(重版校订)

唐敏

(第1—3章, 第5—6章)

梁薇

(第4章)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 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 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 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 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记忆小屋》

《沉痾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 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总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

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

卷三

大衰退 1971—1989

*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目录

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002
第2章	幻想破灭	051
第3章	繁华年代	112
附 记	两种经济的故事	172
第4章	社会民主时期	180
第5章	革命的幽灵	219
第6章	尘埃落定	262



1953

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241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 J·H·普拉姆在其研究 18 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 19 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违背事实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❶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

242

从 1945 年到 1953 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 1919 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 年 7 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为国

❶ J·H·普拉姆，《18世纪早期英格兰的政治稳定发展过程：1675—1725》（伦敦，1967），第十七章。

际和谐提供什么保证。事后想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支付联盟和最重要的北约组织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稳定的体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欧洲委员会召开的“保卫人权大会”的文件显示，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产生持久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就像发表它们的机构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良好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些无效的条约或同盟。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很少予以关注，这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西欧在半清醒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稳定的时代。40年来，西欧各国至少在它们相互之间首次处于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状态。国内的政治冲突逐渐平息。除意大利之外，各国共产党开始逐步退入政治边缘化。人们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复仇主义会卷土重来。

由于冷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西欧人找到了新的安乐。政治对峙的国际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内政治冲突所产生的刺痛。上一个时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战争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土争端、被占领后的奥地利的前途——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控制，总有一天会由强国对峙和协商来解决，而欧洲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德国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后，西欧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不会打算在中欧立刻“建立一个朝鲜”，德国东西双方之间要达成协议仍然为时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场是，1949年形成的两个德国应当重新合并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重新统一并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要让联邦德国（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民众。私底下，美国人像西欧人一样，倒并非不乐意眼看着德国就这样无限

期地分裂下去。正如 1959 年 2 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言：将“对此现状有许多话可说”，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公开表达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 1952 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出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领导人并没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会当回事，他们拒绝采纳苏联的有关建议。虽然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建议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认真指望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从占领区撤军，并且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无任何军事装备的德国游离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中部。要说的话，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们并非不乐意看到美军一直逗留在德国领土上；在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军常驻联邦德国（西德）是防止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放弃这种保证可以换来德国解除军备并受控于苏联手的话（为此目标，莫斯科十分乐意放弃它手中的民主德国〔东德〕和它们的民主共和国），那倒还值得去冒险一试；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试。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联邦德国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 5 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

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244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联邦共和国将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0月，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建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与舒曼计划相仿。除了大会、部长委员会和法庭外，这一共同体还将拥有自己的欧洲防卫军。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当然对此想法很不乐意，但是同意参与，因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防卫问题的最好办法。

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条约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签约国认可这一条约，美国和英国将全力协助欧洲防卫军，并且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苏联曾经徒劳地许诺用一个解除德国武装的《和平条约》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认可了这一《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接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承认了这一条约。^❶现在只等法国国民议会认可这一条约，西欧各国就可以拥有一支所谓的欧洲军队了：将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军队混合组编在一起。

❶ 1951年3月，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克服了国内相当强烈的中立情绪，极不情愿地同意把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并且在1954年准备好5个师供调动。

然而，法国人还是不太高兴。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莱纳敏锐地观察到：“在全体法国人看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在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身上，只有美国人才认为问题出在俄罗斯。”法国人的犹豫不决惹恼了美国，在1953年12月北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能顺利建立，美国就会采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评价”。但是，即便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总理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公众的辩论却早就揭示出法国民众极不情愿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况且，这一份关于德国重整军备并建立欧洲军队的建议提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军刚在越南遭遇败仗，很丢面子。新上任的法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确估计，如果他拿脆弱的联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险违抗民众意愿，而同意法兰西民族的敌人重整军备的话，那就太过冒失了。

最终，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后提交国民议会审批时，孟德斯-弗朗斯拒绝利用这个问题换取美国的信任，从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这个条约。于是，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在欧洲军队中容纳重整军备的德国人这一计划就此宣告终结。在一次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及卢森堡首相约瑟夫·贝奇的私下会晤中，阿登纳恼怒地将孟德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犹太性”——根据这位德国总理的说法，孟德斯将自己和法国民族主义情节纠缠在一起，显得太过分了。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流产，孟德斯自己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欧洲防务共同体里过多地强调了整合，但是对英国却考虑得太少。”

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现在的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约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法国可以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欧洲防务的建立，但却无法长久阻止下去。几周后，国民议会即将就欧洲

防务共同体的问题进行投票，美、英、法这几大西方盟国为此两次会晤，在伦敦和巴黎匆匆召开会议。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提议下，迅速地通过了一系列建议^①——所谓的《伦敦协议》——并在后来的《巴黎条约》上得到最后的完善，奠定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防务政策的基础。

为了解决“对英国考虑得太少”这一问题，艾登提出承担英国军队（4个师）常驻欧洲大陆（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被扩充为“西欧联盟”，德国和意大利都将加入该组织（虽然在我们看来，1948年条约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相互保护、抵抗德国）。相应地，法国将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不超过50万人的兵力；德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北约组织。^②

当这些条约都被认可并开始生效后，德国的被占领地位将从此消失，除了在名义上之外，西方盟国完全地同它们过去的敌人正式和解。盟国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防范德国重蹈覆辙，但在形式上却是以欧洲军队的身份，并将遵守共同协议。对这些新的计划，法国并非毫无异议地举双手欢迎，但因处势不利，只好放弃自己提出的那些变通性的建议。即便如此，联邦德国从1954年的条约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要远远超过普利文计划。在有关德国问题的国际争端中，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敌手了。可以理解，法国对《巴黎条约》也是抱着非常模棱两可的态度。1954年12月30日，国民议会投票认可这些条约，以287对260票、仅27票的多数赞成票得以勉强通过。

① 据艾登所说，这些想法是他在早上洗澡的时候冒出来的。

② 唯一一条明确限制德国重整军备的条件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将来，绝对禁止德国实施核武器计划。